

宁波文化研究工程·专门史研究

南宋宁波文化史

张如安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宋宁波文化史 / 张如安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2
ISBN 978-7-308-10754-9

I. ①南… II. ①张… III. ①文化史—宁波市—南宋 IV. ①K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9131 号

南宋宁波文化史

张如安 著

责任编辑 吴伟伟 weiweiwu@zju.edu.cn

封面设计 俞亚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 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64

字数 1081 千

版印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8-10754-9

定价 128.00 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前 言

宁波旧称明州，南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升格为府，改名庆元，下辖鄞县、奉化、慈溪、象山、定海、昌国六县。南宋时余姚属于越州，宁海属于台州。《南宋宁波文化史》叙述的范围，没有摆脱现行政区地域之囿，即遵从当代人的习惯，按现今的行政区划，将余姚和宁海亦纳入其中。从地理位置看，余姚、宁海与明州六县同属于四明区域，从文化的角度看，南宋时期它们之间并无太过明显的区别。为了行文的方便，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本书在正文的著述中，常以非行政概念的“四明”来指称现行宁波行政区域范围。

南宋是学界公认的四明文化的第一个高潮时期，一直磁石般地吸引着我的视线。明人李堂在《明州歌》中说：“唐开州望治平原，文物熙熙自宋元。”要说两宋时期四明地区的文物熙熙，当然以南宋最具代表性。从大学时代开始，我就搜罗和阅读了有关这段时期的一些历史文献。我是从人物及其作品入手的，杨简、张即之、黄震、王应麟等贤哲的名字，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着。特别是有“七宝楼台”之称的吴文英词，我从《全宋词》中全部手抄下来，时时地咀嚼品味。但起初限于自身的功力，我只能以崇敬的心情仰望着这些文化名流。后来随着阅读范围越来越广，慢慢地终于积累起了自己的感悟和心得，我仿佛遥望到了南宋时代高挂在四明上空的绚丽彩虹，驱使我不断地驻足其间，流连忘返。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非得有一部厚实的著作，才足以发南宋四明文化的璀璨光辉。为此，我再度“抖擞屎肠”，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将若干年前的旧稿《南宋宁波文化史》予以扩充修

订,以了却自己长久的心愿。

文化是由众多的文化要素有序结合的整体,文化的演进及其演进的速率,由时间制约也由空间制约。人类总是在特定的地域空间中创造出自己的文化,并在时间的作用下,文化要素间的结构会发生重组。在同一个国家的文化大家庭下,一地域仍有一地域之文化,并对本地域产生着种种影响。我对地域文化史的理解,已经在《北宋宁波文化史》中得到了表述。本书作为续作,仍旧贯彻了前书的主张。本书力图运用多学科的知识,通过一系列地域文明所遗留的各种痕迹,来认识和把握南宋四明社会。虽然从本质上说,“南宋宁波文化”的含义相当于“南宋时期中国文化在宁波”,但中国文化又是如何在南宋宁波这一特定的时空场景下发展起来的,又为什么那样发展,按照什么样的路径发展,发展出什么样的自我特色,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实都在某种程度上与地域经济社会的整体生活相关联,也是地域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本书力求全方位地描述南宋四明地区大文化的演变及其成就,凡学统之分合、经术之醇漓、史案之异同、诗文之源流、教育之盛衰、科技之传承,莫不提要勾勒,加以评述,既突出主流,也不没支流,力图通过自己的笔触,充分展示四明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尤其是致力于展示四明文化高潮时期的种种表现,展示富有文化底气的南宋四明的特殊魅力。南渡以来,气钟清淑,运在四明,声教浚涤,精彩呈露,我常常为之神魂飘荡,不能自抑,恨只恨没有五色之笔啊。

本书在写作中,尽可能地吸收学术界的既有成果,同时我更在意把自己的想法传达给读者。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耗费了大量的时间通读原始文献,所有我能找到的南宋四明籍人士的著作,我全部读了,更多的夹杂在别集、经解、笔记、方志、家谱、碑铭等文献中的零珠碎玉,多为学人所遗落,我也不忘勘探开采,以发掘其华彩,或还原被遮蔽了的一些事实。如史浩《周礼天官地官讲义》、曹粹中《放斋诗说》、沈焕《礼记》解、郑鏊《周礼解义》、王应麟《小学箴》佚文等,均第一次得到引用。但南宋时代距离今天毕竟有800年之遥,早已是多少野草湮没旧痕了,要在野草丛中找回旧日的踪迹,显得相当困难。本书引用的很多资料,都是笔者在日积月累的寻寻觅觅中从不同的历史角落中偶然得到的。当然,那些笔者不辞辛苦汇聚起来的原始文献材料,一如无准师范所说:“半真半假千家货,非实非虚百宝囊。尽底打开都见了,有谁会火共分赃?”我不得已对这些“半真半假”(甚至有可能是全假无真)的“千家货”,下了一番剔假存真的鉴别工夫。特别是我

所查阅的众多本地域的家谱,但凡涉及宋代的内容,肆意编造、漏洞百出者不胜枚举。凡此,引用时不得不倍加小心。即便是一些经常被人引用的材料,我也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如有些学者每喜引陆游的《石堰村》诗,事实上陆游笔下的石堰属会稽县而非余姚县,故本书不予采辑。除了少量的考古材料及历史遗物之外,我只能从文献中探求南宋四明人的思想精蕴,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领略他们的诗意想象。几年纸上苦追寻,字字浑是先贤声。我确实有点不舍得让先贤幸存的文字永远埋没下去,因此在写作过程中,宁肯牺牲一点行文的流畅性,也要尽可能多地引用一些宝贵的文献资料。但光有文献材料的堆积显然是不行的,文化史并非由专门史文献材料丛集而成,须别具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要做到这一点显然难乎其难,我将努力而为之。

十余年来,宁波学界关于南宋四明地域史著的综合性著作,初有乐承耀教授《古代宁波史纲》的描述,后以张伟教授主编的《宁波通史》(两宋卷)最为全面,本书在篇幅上较后者扩展了三倍,写作的困难性自然成倍地增加了。因为篇幅大增,延伸到了许多无人开垦的冷冷篱落,行文上再也无可回避,只能直面遇到的困难,想办法克服它,为此付出的精力是难以想象的。

记得宋僧宝昙曾警告说:“今人不是弄潮手,劝汝莫入洪涛中。洪涛无情,坏汝性命。”我深知自己不是“弄潮手”,但是为了深入探究我所心仪的南宋四明文化,还是义无反顾地跃入了洪涛之中,虽然呛得眼睛翻白,但最后终于扑腾着爬上了岸。要说“弄潮”或许还远不够格,但总算还是下了浑水、试了深浅的,对我来说,收获也不算小了。我愿意将长期涉险下水的成果拿出来,至于是鱼是龙,非鱼非龙,也就一任读者评说了。兹取韵语二句以表达我的感受:澹荡春风侠气兴,思开九畹树香萝。

目 录

概 说	(1)
第一章 经济表现:土狭人稠,四处突围	(11)
第一节 兴修水利,开辟农田	(11)
第二节 “人力勤而地力且尽”的农副业	(20)
第三节 “冒险而渔取”的渔业	(33)
第四节 “执艺而精良”的手工业生产	(39)
第五节 “通货而贸迁”的商品经济	(55)
第二章 儒学思想:派虽不一,皆有心得	(74)
第一节 洛学遗绪,其道未大	(75)
第二节 史浩袁文,堪称先驱	(95)
第三节 淳熙大儒,阐明正学(上)	(106)
第四节 淳熙大儒,阐明正学(下)	(126)
第五节 理宗前朝,陆学余绪	(151)
第六节 晚宋新潮,以朱变陆(上)	(167)
第七节 晚宋新潮,以朱变陆(下)	(185)

第三章 史学成就:旁搜博征,经世致用	(201)
第一节 理宗朝以前的四明史学	(201)
第二节 援经析理,务求其是:黄震的史学成就	(209)
第三节 综罗文献,兼取百家:王应麟的史学成就	(215)
第四节 传教明宗,分灯照世:佛教史学的繁荣	(223)
第五节 地方史志、文献的编修	(234)
第四章 其他学术成就	(243)
第一节 经济思想	(243)
第二节 经学成就	(249)
第三节 语言文字研究	(274)
第五章 文学艺术:群贤蔚起,各出才笔	(284)
第一节 南宋四明文学概说	(284)
第二节 诗歌创作(上)	(290)
第三节 诗歌创作(下)	(323)
第四节 词的创作	(345)
第五节 诗词唱酬的兴盛	(357)
第六节 散文创作	(364)
第七节 小说和戏剧	(403)
第八节 文学批评	(412)
第九节 音乐歌舞	(421)
第十节 绘画艺术	(441)
第十一节 书法艺术	(461)
第十二节 雕塑、园林等	(473)
第六章 教育事业:家诗户书,传学彬彬	(483)
第一节 多层次、多渠道的办学体系(上)	(484)
第二节 多层次、多渠道的办学体系(下)	(498)
第三节 私学教师群体与尊师风气的形成	(518)
第四节 科举社会的形成	(526)
第五节 丰富多彩的教育思想(上)	(534)

第六节	丰富多彩的教育思想(下)	(556)
第七节	蒙学读物的编写和家训的兴起	(567)
第七章	科技成果:观变察机,多能巧思	(583)
第一节	农学成就	(584)
第二节	生物学成就	(598)
第三节	医药学成就	(618)
第四节	其他科技成就	(635)
第八章	图书事业:渊涵文献,无所不贯	(653)
第一节	藏书事业的勃兴	(653)
第二节	编书和刻书	(668)
第三节	图书学研究	(684)
第四节	四明女性的阅读活动及其意义	(696)
第九章	宗教兴盛:宝地金绳,禅教都会	(709)
第一节	南宋四明佛教兴盛概述	(709)
第二节	曹洞复兴:以正觉、如净为轴心	(720)
第三节	临济当家:以圆悟系为主流	(740)
第四节	台教鼓行:以四明系为中心	(755)
第五节	净土胜缘和律宗衰微	(766)
第六节	四明士人与佛教	(778)
第七节	四明道教与文人的崇道	(797)
第十章	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特色鲜明	(822)
第一节	乡闾义风	(822)
第二节	社群文化	(858)
第三节	饮食烹饪	(879)
第四节	花卉之好	(906)
第五节	旅游活动	(917)
第六节	婚丧习俗	(933)
第七节	民间信仰	(946)

第十一章 对外交流：文明传播，盛况空前 (959)

 第一节 佛教传承：东海儿孙日转多 (959)

 第二节 唐物东渡：四明与日本的其他文化交流 (978)

主要参考文献 (994)

后 记 (1005)

概 说

北宋时期,四明文化已经有了良好的发展。然而建炎之乱,让四明地区遭受了一场毁灭性的灾难。袁燮说:“建炎猾夏之祸,四明最酷,玉石俱焚。”^①楼钥说:“建炎三年,吾乡被兵祸最酷,远如昌国颛颛,独居一海中,亦遭焚毁。”^②又云:“建炎三年,此邦兵毁最酷,旧物几无存者。”^③可见建炎之乱的毁灭性打击,深刻而又长久地记忆在明州人的心中。但随之而来的宋室南迁、定都临安,对浙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影响,不但较快地平复了四明地区的战争创伤,也有力地带动了四明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昌明。昔日的海边小郡顿然成为近畿之地,四明在“甸服中,声教浚涤,精彩呈露,月异而岁不同”^④,可以说其社会面貌的改观是快速而惊人的。宋人姚勉说:“四明,文物邦也。”^⑤元人袁桷说:“至宋受版图,兴文儒,鄞士在汴始盛,渡江以南,云滃川涌,几二百年。”^⑥舒岳祥说,宁海“乾淳以后,礼乐文物被焉,彬彬焉多士矣”^⑦。方孝孺说:“宁海在宋,特为诗书文物

① (宋)袁燮:《絮斋集》卷8《跋林户曹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宋)楼钥:《攻媿集》卷74《书李氏〈建炎备御录〉后》,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宋)楼钥:《攻媿集》卷74《跋再刊裴公纪德碣》,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明)崇祯《宁海县志》卷11,明崇祯五年刊本。

⑤ (宋)姚勉:《雪坡集》卷33《明州奉化县梓潼帝君殿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30《任隐君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宋)舒岳祥:《阆风集》卷12《故多峰应君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之邑,去南渡国都为近,故士之显闻于世者甚众。”^①这些都概括地描述了南宋四明地区文化繁盛的空前盛况。然而这种繁荣的取得,主要不是遵循本地域北宋文化发展的自我惯性运行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定都临安、移民涌入等外部因素的刺激作用,由此引起四明文化的跳跃性发展。

南宋四明的经济和文化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和兴盛,人口激增乃是一个极为明显的驱动因素,其中大规模的移民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靖康之后,两浙路成为中原移民的集散中心,“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②,迁入四明地区的也不在少数。这种情形的发生当然与四明地区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和平的生活条件有着密切的联系,诚如明人黄润玉所说:“明之为州,本春秋于越甬东也。山川包络,有金汤之固;土壤衍沃,无灾厉之虞。加之民俗淳庞,虽中原丧乱,恬然绝草窃狼烽之警,故天下衣冠之避乱者多归焉。”^③据吴松弟估算,绍兴和议签订(1141)之前,明州的移民可能有一万乃至数万,^④明州因此而成为“二浙衣冠人物最盛之地”^⑤。可以说北宋靖康之乱后,四明地区的移民呈现为集团性特征,其数量、规模以及对四明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均是空前的。

从四明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视角观察,人口激增最为关键。大量的移民聚集在城区,进一步推动了甬上城市化的发展步伐,魏峴有“今城中十万户”^⑥之说,这个数字虽然很夸大,但却可以想见甬城人头攒动的景象。移民的大量涌入,凸显了本区域“土狭人稠”的紧张关系,从而直接推动了当地向丘陵山地和海涂要粮的垦荒浪潮,也迫使人们竭力提高农业内涵生产力水平,引发了耕作技术和制度的新变化,同时促使人民更积极地在农业经营之外寻求突围之路,从而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诚如陆敏珍所指出的:“人口的变化引起了交通、水利、技术

① (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12《刘樗园先生文集序》,徐光大点校本,宁波出版社1996年版,第396页。

②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8,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573页。

③ (明)黄润玉:《宁波府城隍神庙之碑记》,见章国庆、裘燕萍:《甬城现存历代碑碣志》,宁波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④ 吴松弟:《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⑤ (宋)梅应发等:《开庆四明续志》卷1《科举》,《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3614页。

⑥ (宋)魏峴:《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卷上《日月二湖》,俞福海、方平点注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页。

与制度等一系列的连锁变化,并且使这些处于关键点上的变化成为独立的动力要素,共同发挥作用,将明州从一个落后的边缘地区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自我发展动力与能力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区域。”^①

移民因素不但促进了四明地域经济的发展,也对本地的文化事业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南宋浙地的移民大多来自河南、山东一带,且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质,正如右谏议大夫郑穀所说:“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藪,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②孙覿亦说:“四明,浙东佳处,年来士大夫避地多在温、明间。”^③这些高素质的移民分布于四明各地,立定脚跟,繁衍成族,并很快显示出独特的文化优势。清人范光阳说:“自宋建炎四年兀术屠明州,其故家旧族逃亡杀掠殆尽,今郡城衣冠家多南渡后占籍者。”^④这仅是就四明郡城而言。全祖望又进而指出:“吾乡六县世家右姓,其为南宋寓公之后甚多。盖山海之间,足以避地,而其时又近行都,为畿辅也。”^⑤这是就整个明州而论的,并指出明州的自然环境适合躲避战乱的移民定居。鄞县的小溪镇,“三境交接,大江贯其中,群溪毕会,水清泠如明镜,岩峦拥秀,千篙竞发,碧瓦朱甍,翬耸鳞比,望之如神仙居”,因此而成为移民的聚居地,“宋绍兴中,北客多乐居之。魏文节公结圃墅,与客大梁张武子为诗友。其他如安仪同孙、王尚书相继卜筑,而为是镇者于于养恬,承接履舄,争斗绝庭下”。^⑥慈溪自“建炎南渡,衣冠士族,览山川之秀,多卜居焉,科文始盛,名族率称汴宋遗宗”^⑦。再以奉化而论,戴表元说:“于时浙中诸老林立,寄公侨客自中原避兵来者泉集,而吾州尤为渊藪,衣冠谈笑,朝暮翕合。”^⑧四明地区的移民不乏皇族子孙,如《余姚县志》记载,南渡时“高、曹、向、孟四姓(按:指仁宗后曹氏、英宗后高氏、神宗后向氏、哲宗后孟

① 陆敏珍:《唐宋时期明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97页。

②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05页。

③ (孙)孙覿:《内简尺牋》卷2《与杨枢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清)范光阳:《双云堂文稿》卷5《文学范懋修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⑤ (清)全祖望:《鮑埼亭集外编》卷13《竹洲晏尚书庙碑》,《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99页。

⑥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19《鄞县小溪巡检司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清)光绪《慈溪县志》卷55《风俗》引《嘉靖志》。

⑧ (元)戴表元:《剡源文集》卷9《朱伊叟诗序》,《戴表元集》,李军、辛梦霞校点,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页。

氏俱来余姚”^①；明州城中的握兰坊以及君子营街西一带（今属海曙区）即为宗室赵氏的聚居地，出了赵善湘、赵汝楫等一批名流，握兰坊又有皇亲宫，南渡后赐居英宗高皇后之族。^②而鄞之茅山，则为赵粹中、赵遵父子所居。^③寓居定海长山净居院（今属北仑区小港街道）之左的赵氏一支，后来出了赵与懌等名人。^④四明移民更不乏显贵之家，全祖望说：“建炎扈从诸公，如郑世忠、张麟、潘迪、李显忠，皆有后人居鄞，大率南渡初留此。”^⑤明确指出南宋初的鄞县移民有部分是扈从诸公的后裔。江东石水缸张氏，先世自南渡迁于鄞之甬东横街，当时相携而至的宦族多达36家，冠盖相望，称为“锦绣街”。^⑥南渡人士中高元之、张即之、王应麟等皆为杰出之辈。移民作为极为重要的人力资源，对四明文化的骤然崛起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也为四明文化实现跳跃式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南宋四明高素质移民集团，不仅直接带来了中原的文献和学术，而且与四明本土人士的文化互动更趋紧密，从而共同促成了四明地区教育与学术的繁盛。尤其是京城与四明之间的距离远近，对于四明士人功名进取之心影响极大。即以奉化为例，戴表元说：

吾奉化前百数十年时，地理去行都远，士大夫安于僻处，无功名进趋之心，言若不能出诸其口，气若不欲加诸其人，闭门读书，以远过咎，耕田节用，以奉公上。虽无当涂赫赫之名，而躬行之实为有余矣。渡江以来，乡老之书，天官之选，信宿可以驿致，加以中原侨儒裹书而来，卜邻而居，朋侪熏蒸，客主浸灌，编户由明经取第者十有八九，可谓诗书文物之盛。^⑦

戴表元的这段话，特别强调地理与行都的远近对于激发士人进取心的特殊意义，通过与南渡之前后情况的纵向对比，更加凸显了南渡后中原侨

①（清）光绪《余姚县志》卷14《古迹》“向家池”条。

②（清）徐兆昂：《四明谈助》卷25，宁波出版社2000年版，第809页。

③（清）徐兆昂：《四明谈助》卷42，宁波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9页。

④（清）赵有深、赵九和修：《四明赵氏宗谱》卷4，天一阁藏清同治八年乐善堂木活字本。

⑤（清）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47《答蒋生学镛问湖上三庙缘起》，《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784页。

⑥（清）徐兆昂：《四明谈助》卷32，宁波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6页。

⑦（元）戴表元：《剡源文集》卷9《董叔辉诗序》，《戴表元集》，李军、辛梦霞校点，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

儒促使奉化地区文化面貌发生巨大改变的历史功绩。元人董复礼则进而论述南宋至元明州士大夫数量的锐减情形,亦从地理之远近的视角立说:

吾州南宋时地理去行都为最近,士大夫有志于进取者,不赢餽粮,不弊輿马,不历旬月,已达于关郊之内矣。百余年间,士之烝农亩,就选举,至于达官抚仕,金章朱轂,纷纭杂遄,照映里闾,视旁郡为多。皇元受天命,建邦燕蓟,幅员之广,轶于禹迹。凡选贤命士之法,验其材质能否而进退之,固不限于中外遐迩也。然而,吾州僻处东粤(按,“粤”古同“越”),壤杂荒服,水陆之途数千里不啻,往往赢餽粮、弊輿马,历月移旬,然后传于都邑。丰者安于田里之乐,窳者窘于舟车之费,苟非有志于时者,每惮于劳,而进取之志息焉。故数十年之内,士大夫登朝廷、仕州郡者仅屈指计,较以向时之盛,百不及一二。^①

董复礼认为明州与行都在地理上的远近,直接关系到本地士人求取功名所付出的成本,所言也是很有道理的。从戴表元、董复礼两人通过南宋与南宋前后的纵向对比,明确揭示出南宋定都临安对于四明人才脱颖而出的特殊意义。这种地理因素可以转化为促进本地区教育事业欣欣向荣的一种动力。

南宋四明地区教育空前繁荣,教育的覆盖程度很高,“其民……力本务农,好学笃志,尊师择友,弦歌之声相闻,下至穷乡僻户,耻不以诗书课子孙,自农工商贾鲜有不知乎章句者”^②。教育的成功,使得本地区人才济济,其盛前所未有,以至于史浩有“繄我四明,实生多士”^③之叹。关于南宋四明人才之盛,文献多有记载。陈造说:“夫四明多士之地,凡昔之光贲史册,今之辉映缙绅、标表士林者,不知其几。”^④祝穆记载说:“世底休明,时乃生于多士;气钟清淑,运实在于四明。”^⑤十分恰当地说明了“多士”带来了四明社会的“世底休明”。四明“多士”,就其队伍结构而言,主要表现为受到良好

① (明)郑真:《四明文献集》卷中董复礼《送童敬初赴都序》,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49册第6页,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

② (元)赵孟頫:《题三氏同宗会谱后》,见《鄞邑城南袁氏三修宗谱》卷首,宁波市档案馆藏本。

③ (宋)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39《燕新第乡人致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宋)陈造:《江湖长翁集》卷26《答刘秀才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宋)祝穆:《方輿胜览》卷7《庆元府·四六》,施和金点校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24页。

教育的儒士之众。胡刚中在《重修定海学记》中说:“四明,人物之渊,自公卿至大夫日益盛,则业于士者宜尤盛。……夫士所以为公卿大夫之阶也,而学固所以为士之阶也。故为公卿大夫者必以学,为公卿大夫之后必习于学。”^①这就将学、士与公卿大夫之间的关系说得非常清楚。仅以鄞县一地而论,元袁桷说:“至宋受版图,兴文儒,鄞儒在汴始盛。渡江以南,云滃川涌,几二百年。”^②清人王杰说:“鄞自有宋以来群儒辈起,照耀史册者林立也。”^③南宋这种“群儒辈起、照耀史册”的景象,不但在鄞县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也是整个四明地区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难怪袁桷等人为之激动,为之惊叹。

南宋四明庞大的业儒人群,为本地区的科举之盛创造了无可比拟的优势。据《延祐四明志》统计,北宋时期四明进士共有124人,南宋时进士人数激增至776人,其中赵姓士子的人数几近五分之一。^④科举之盛也关联着世族之繁衍,元人邓文原指出:“异时甬东多高门右族,接武卿相,势利声华,文学行义,其不朽者固有在学者。”^⑤可见教育的兴盛与高门右族的繁衍有着相互的推荡作用。同时四明地区长期承平的社会环境,十分有利于高门世族的生息繁衍,如明代张邦奇所说:“四明在海隅,前代兵燹鲜及,故旧族居多。”^⑥南宋时期的四明文化中,世族网络发挥着十分活跃的能动作用。甬上的史、楼、袁、薛、陈等无一不是文化家族,诗文书翰累世流传。其中如马园丰氏,在宋就有进士7人,楼氏在南宋有进士23人。科举之盛与仕宦之盛更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宋史》列传的南宋四明人物32人,其中进士计29人,^⑦很能说明问题。史弥远专权以来,为了“惩意外之变”,专用左右亲信,精心搭建了一个庞大的相党集团。客观上,史弥远当政期间,四明人士有更多的机会得到奖拔任用,从而形成“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的局

① (元)袁桷:《延祐四明志》卷14《学校考下》,《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9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4265—4266页。

②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30《任隐君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清)王杰:《鄞县重修学宫记》,见钱大昕纂,乾隆《鄞县志》卷5《学校》,《续修四库全书》本。

④ 陈晓兰:《南宋四明地区教育和学术研究》,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

⑤ (元)至正《四明续志》卷7 邓文原《奉化州儒学记》,《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10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4623页。

⑥ (明)张邦奇:《张文定公环碧堂集》卷14《记瑞室卷后》,《续修四库全书》本。

⑦ 陈晓兰:《南宋四明地区教育和学术研究》,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

面。^①如余天锡、郑清之、宣缜等四明人士都因为参与了物色、教育、扶植宗室子赵与莒之功而得到进用,袁韶也是史弥远一手提拔起来作为心腹的,楼钥则是因为反对韩侂胄而被起用。刘克庄更是明确指出:史弥远“所拔之士,非鄞即婺”^②。显然,史弥远对于人才的选拔具有鲜明的地域倾向性。但仔细探究起来,四明人士大量进入官场的原因其实很多,他们并不全是因为和史弥远的裙带和乡谊关系而获得职位,更多的是通过真才实学和恪守尽忠而进入仕途的。而同时期四明地区教育事业的高度发达,更为人才的群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故张其昀说:“南宋中叶,四明仕宦,甲于海内,衣冠文物,日以盛大,躬行笃实,家诗户书。”^③可以说,发达的教育对于四明人才的鼎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也为官僚阶层的大量涌现准备了充足的后备人才,此即胡刚中所谓“士之成材亦备,则公卿大夫之盛,继自今当益彬彬焉”^④。而史弥远的独相则进一步扩大了四明人士进入仕途的优势。清人钱维乔指出:“自嘉定戊辰至淳祐辛亥四十四年之间,四明仕宦甲于海内,史弥远独相二十六年;而郑清之继之前后,再入相,凡七八年;史嵩之为右相亦六年。执政则楼参政钥、宣枢密缜、袁枢密韶、陈签枢卓、余参政天锡、应参政籀、史枢密宅之凡七人,而赵善湘亦以军功与执政恩例。史氏一门丞相三人,执政二人,袁、郑、余皆史所援引,宣则史之姻戚,善湘亦史姻家也。”^⑤在近半个世纪里,出现这样的情景,着实令人惊叹,在四明历史上可谓空前而绝后。全祖望指出:“吾乡自南渡绍兴而后,方有登政府者,而史氏一门五人,相始终焉。史氏宰执自参政(史才)始,吾乡宰执亦自参政

① (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41《丁给事神道碑》,《四部丛刊》初编本。

③ 张其昀:《宋代四明之学风》,见《张其昀先生文集》,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67页。

④ (元)袁桷:《延祐四明志》卷14《学校考下》收录(宋)胡刚中《重修(定海)学记》,《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9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4266页。

⑤ (清)同治《鄞县志》卷69引(清)钱维乔《日湖访古录》。

始。”^①又说：“且吾乡宋时官宰执者十八人。”^②因此，南宋四明有“相乡之地”^③的美誉。至于南宋四明的鼎贵之家，更是多得难以计数，袁桷说：“甲族鼎贵，莫盛吾里，薨栋接耀。”^④又说：“余幼居乡，合郡里巷，考门閭之高者，十居其六七焉。”^⑤这在四明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景象。

伴随着教育的繁荣，南宋四明学术文化臻于发达。南宋初期，高阅可算是明州地区正式传播理学的第一人。迨及宋孝宗时期，四明士人谈说道德性命之学已经蔚成风气。乾道、淳熙年间，理学极盛，涌现了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宗师。淳熙八年（1181）吕祖谦去世后，朱学和陆学遂成为南宋理学最重要的两大流派。浙东学术开始独立亮相，出现了四个极为集中的中心区域，其中四明以杨简、袁燮、沈焕、舒璘为代表的“淳熙四先生”，以陆氏心学为内核，并广泛地吸收事功学思想，形成了“四明学派”，四明也因此成为浙东的四个学术中心之一。宋末，黄震、王应麟、史蒙卿等人积极倡导朱学，四明的学术开始由陆向朱转轨，但四明的朱学仍旧包含有陆学的成分。大致自甬上“淳熙四先生”始，地域主体的创造精神受到全面激活，四明文化终于别开生面，获得了地域自立。甬上“淳熙四先生”之前，四明还在不断地吸纳中原的、外来的异质文化的汁液，一直处于文化的受动性嬗变阶段。自甬上四先生开始，文化的净输入状态达到平衡，地域文化的自主性获得张扬。自淳熙至宋末元初，是为四明文化的高峰期，理学、史学、文学、书学、教育等均有杰出人士主盟其间，杨简、吴文英、张即之、王应麟、黄震等，在各个领域的文化成就均居于全国前列，甚至不乏开创性的贡献。这样，因四明学人搏击于时代的激流之中，在兼容中保持特色并不断创新，并推出了不少文化精品，四明遂由原来的学术文化的边缘化地区一

①（清）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45《答万九沙编修问史参政遗事帖子》，《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5页。

②（清）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45《答董愚亭兄弟论董氏宗谱书》，《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下册第1733页。此文有李氏注云：“《宋史·宰辅表》：宰相四人：史浩、史弥远、郑清之、史嵩之。宰执七人：史才、楼钥、宣缜、袁韶、余天锡、应麟、史宅之。共十一人，余七人不知何姓名，俟考。或刊者误一为八。”见《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3页。按，胡文学编《甬上耆旧诗》卷2亦云：“位至执政者十八人。”则全氏之说当本于李邕嗣。

③（宋）祝穆：《方輿胜览》卷7《庆元府·四六》，施和金点校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23页。

④（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30《海盐州儒学教授袁府君墓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19《友恭堂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